

《圣经文学研究》创刊词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河南大学 梁 工

Liang Gong,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Judeo-Christian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world civilization is widely acknowledg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West, Judeo-Christian culture and Hellenic culture are regarded as the two breasts that nurtured the youthful nations of Europe. Together with the ancient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dia, they constitute world civilization as we have it today. Therefore to understand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world civilization, the Bible as Scripture and the basic texts of Christianity must be studied.

近代以来，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世界文明肌体的建构意义日益为学术界所公认。在西方，它与希腊文化被并称为“二希”，二者被确认为哺育西方年轻民族成长的“两只乳房”。^① 延及全世界，它则与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鼎足而四，联袂支撑起

^① 朱维之，《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载王汉川等主编，《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欧美文学》，中国盲文出版社，2004，第18页。

世界文明的巍巍殿堂。而追根探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庞大体系乃建基于一部皇皇经典,那就是圣经。这一史实表明,欲了解世界文化,不能不深入钻研圣经。

324

圣经是古犹太文化的百科全书,具备三种基本性质: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是神学—伦理学典籍;从历史角度看,它是史学和历史文化典籍;从语言和审美角度看,它还是文学典籍。它的叙事性作品(历史书、故事书、福音书等)和诗歌书(《诗篇》、《哀歌》、《雅歌》等)皆有浓烈的情感性和鲜明的形象性,接近于近世所谓的“纯文学”;其余篇幅主要是论说性散文(先知文学、启示文学、书信文学等),与近世论说文学多有相通之处。圣经中远离当今文学定义的是一批星散于律法书和历史书中的家谱、族谱、人名录、典章律例条文等,但它们皆未独立成卷,而是穿插于特定故事情节中,成为某篇叙事性作品的有机构成要素。比如,耶稣的家谱本身算不上纯文学,但若将其置于耶稣降生的故事情节中,它就转换为对耶稣身世的宏观概述,从而具备了某种文学意味。当然,若着眼于神学—伦理学和历史文化层面,它又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圣经作为神学—伦理学典籍、史学典籍和文学典籍的三重性质势必导致三种类型的研究,诚如勒兰德·莱肯所言:“圣经文本既然是多种文类的混合,显然,对待某个段落就能从不同视野、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除了依据三种作品类型思考问题,还必须了解三种诠释途径:神学途径主要关注某个段落中的道德神学观念;历史途径主要关注圣经作者笔下的实际人物和事件;文学途径则聚焦于文本的特色、文本基于感性经验的具象性、对各种文体的运

用、素材得以表现的艺术性(特别强调统一性),以及文学的语言手段。”^①

其实,这三种研究在圣经学术史上始终是并行不悖的,只是在不同时期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神学—伦理学诠释绵延始终,19世纪之前一直稳居主导地位;历史批评于18世纪下半叶以后异军突起,取得一系列令人称道的成就;文学研究固然源远流长,却一直是涓涓细流——18世纪中期以前人们研究“圣经中的文学”,主要是一批故事和诗歌;从18世纪下半叶起,开始用历史考据法揭示圣经文本的形成史及其正典化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则借助于多元化的路径和方法对圣经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现代观照,并探讨“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致使一批领风气之先的论著相继问世,包括罗伯特·奥特的《圣经的叙事艺术》(1981)、诺思洛普·弗莱的《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1982)、梅厄·斯腾伯格的《圣经叙事诗学:意识形态的文学与阅读的戏剧性》(1985)等。

在中国内地,虽然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朱维之等现代学者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对圣经文学做过精辟的论述,但因50至70年代内地遭遇长达30年的学术断层,80年代以后的圣经文学研究事实上是从头起步的。从那时起到如今,不可否认,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我们大致了解了圣经文学的总体面貌、主要成就及其别具一格的文学性质,意识到这是一种用特定语言写成、与宗教信仰水乳交融、既渗透历史元素又饱含个人情感的民族文学;其规模不算庞大,质量却特别精良,以致成为世界古典文学的重要体现者,并借助于基督教的传播,对后代文学和文化发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圣经文学研究带动了西方文学中“二希”传统

^① Leland Ryken.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p. 14.

的研究,使我们形成重构世界文学史的新途径;且推动了中国文学与圣经—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以及二者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拓宽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我们已经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大致看到国外圣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初步了解到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它们必将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宝贵镜鉴。就方法论而言,我们也能突破文学社会学的单一构架,而多样性地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阐释学等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取得具有现代学术意蕴的研究成果。

20多年来,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从一块荒芜之地结出相当丰硕的果实,成就是令人欣慰的。然而,缺陷和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就成果的规模和数量而言,这方面的论文论著还过于单薄;就成果的质量而言,不少论述仍停留在一般评介或赏析的水平上,缺乏深刻而富于创见的理性思考。总之与国际圣经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相比,我们的成果还处于较低级的学术层次,有必要采取各种方式寻求突破。

创办中文学术期刊《圣经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谋求借助于办刊的方式,使我们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逐渐接轨。该刊将在较高层面上开辟一块专门的园地,持续发表海内外学者的高质量论文,以求引导并推动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并促进港台地区、东南亚乃至国际华裔圣经学者不断进入最佳的学术境界。